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是为广大学子和青少年编写的一套表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丛书，丛书按时间跨度分成10册。本册主要向读者们介绍从刘邦建汉到魏晋时期的名家和作品，包括作家生平 and 主要作品的介绍，并且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赏析，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业余读书生活的佳品。



现代文学观止

中华

历代文学

观止

周成华◎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是为广大大学和青少年编写的一套表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丛书，丛书按时间跨度分成10册。本册主要向读者们介绍从刘邦建议到魏晋时期的名家和作品，包括作家生平 and 主要作品的介绍，并且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赏析，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业余读书生活的佳品。

现代文学观止

中华
历代文学
观止

周成华◎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学观止/周成华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9

(中华历代文学观止)

ISBN 978 - 7 - 5601 - 6427 - 4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7229 号

书 名:现代文学观止

作 者:周成华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王世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6427 - 4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新文学。

中国的现代文学以1917年1月《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为发端,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终结。它包括在此期间的各种文学运动、文艺思潮,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同类型作家的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说法,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学形态的概念。现代文学的创作者是用符合现代特征的艺术形式、审美趣味和语言表达方法,来阐述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心理。从形式上看,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种不同既有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和心理内涵的不同,也有艺术形式、审美趣味、语言方式的不同。

我国的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学家和作品,也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形式的发展。现代文学既是对古典文学形式的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积极成果。由于现代文学的形成时期,正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走到末路、社会产生巨变之前夜,可以说是社会的巨变催生了现代文学的思潮,而现代文学的思潮又高速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现代文学当中产生了许多经典,到今天的大中小学的中文课本里,现代文学的篇章都有着独特的地位。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我们能够读到那个时代的巨变、社会变革的彷徨、以及艰难时世的沧桑。

本书着重介绍了一些现代文学的类别、流派、名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向我们广大的学子和青少年展现了过去的那段风起云涌的文学艺术时代。由于时间匆忙,难免有疏忽未尽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发现后批评指正,编者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予以补足、修订。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 小 说

鲁迅	3	郁达夫小说	78
《呐喊》和《彷徨》	8	郭沫若小说	81
《阿 Q 正传》	13	张资平小说	82
茅盾	15	早期普罗派	85
茅盾小说的阶级意识和文化心理	20	蒋光慈小说	88
茅盾的文学风格	26	华汉小说	90
巴金	31	洪灵菲小说	93
巴金思想的历史结晶	31	左翼小说	96
巴金的民族悲愤	36	丁玲小说	96
三部曲形式和文学风格	41	胡也频小说	102
老舍	44	柔石小说	105
《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	48	魏金枝小说	109
老舍的文学风格	54	叶紫小说	113
问题小说与为人生派	59	张天翼小说	115
冰心小说	61	吴组缃小说	121
庐隐小说	61	蒋牧良小说	124
叶绍钧小说	62	四川乡土作家群	128
王统照小说	63	李劫人小说	131
许地山小说	65	沙汀小说	134
乡土派	66	艾芜小说	139
许钦文小说	68	东北作家群	140
鲁彦小说	72	萧军小说	142
台静农小说	74	萧红小说	143
浪漫派	77	京派作家群	146
		沈从文小说	148

萧乾小说	151	柳青小说	192
靳以小说	154	孙犁小说	195
其他京派小说家	161	周立波小说	198
新感觉派	162	国统区小说	199
施蛰存小说	163	张爱玲小说	199
穆时英小说	164	钱钟书与《围城》	203
战区流亡作家	166	路翎与《财主底儿女们》	207
碧野小说	168	梅娘小说	208
姚雪垠小说	170	早期鸳鸯蝴蝶派作家	209
王西彦小说	175	社会言情小说	210
解放区小说	181	武侠小说	212
赵树理的小说	186	侦探小说	214
马烽小说	189		

第二编 诗 歌

尝试派诗人与他的作品	219	新格律诗派	236
名篇赏析	220	名篇赏析	238
小诗	胡适220	再别康桥	徐志摩238
蝴蝶	胡适221	火车擒住轨	徐志摩240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221	红烛	闻一多242
暮	俞平伯222	死水	闻一多244
月夜	沈尹默223	雨景	朱湘245
秋晚的江上	刘大白224	冯至与沉钟社	245
湖畔诗人与他们的作品	224	名篇赏析	247
名篇赏析	229	绿衣人	247
妹妹你是水	应修人229	象征诗派诗人与他们的作品	248
蕙的风	汪静之230	名篇赏析	249
伊底眼	汪静之231	弃妇	李金发249
左翼诗人	231	雨后	穆木天250
名篇赏析	234	红纱灯	冯乃超251
老马	臧克家234	郭沫若与现代自由诗	252
三代	臧克家234	《女神》	254
血字	殷夫235	名篇赏析	257

凤凰涅槃	257	泥土	鲁 藜284
现代派诗人与他们的作品	267	悬崖边的树	曾 卓285
名篇赏析	269	在牢狱	牛 汉286
雨巷	戴望舒269	中国新诗派	288
寻梦者	戴望舒271	名篇赏析	289
预言	何其芳272	野兽	穆 旦289
圆宝盒	卞之琳274	秋	杜运燮290
飞尘	废 名276	金黄的稻束	郑 敏291
七月派诗人与他们的作品	277	遗忘	唐 湜292
艾青与他的作品	278	沉钟	袁可嘉293
名篇赏析	280	山中所见——一棵树	辛 笛294
义勇军	田 间280	招隐	金克木295
黎明的通知	艾 青281	李季与《王贵与李香香》	296
憎恨	绿 原283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	李 季297

第三编 散 文

第一个十年散文	303	藤野先生	329
周作人与美文	304	小丑艺术	333
朱自清和冰心	305	第二个十年散文	335
名篇赏析	306	语丝派及林语堂散文	338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306	现代评论派散文	339
五祖寺	废 名308	何其芳、李广田、丰子恺的散文	339
附记	309	夏衍与报告文学的兴起	342
背影	朱自清311	名篇赏析	346
荷塘月色	朱自清313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346
闲情	冰 心316	我的母亲	胡 适351
落花生	许地山318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354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圣陶319	故都的秋	郁达夫356
鲁迅杂文和散文	320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358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322	济南的冬天	老 舍361
《野草》和《朝花夕拾》	323	山水	李广田362
名篇赏析	326	雨前	何其芳36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26		

第三个十年散文	367
梁实秋散文	369
名篇赏析	371
白杨礼赞	茅盾371
辣椒	王了一373

雅舍	梁实秋375
沅陵的人	沈从文379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385
废园外	巴金388

第四编 戏剧

中国话剧的起源	393
左翼戏剧运动	396
田汉与夏衍的创作	397
欧阳予倩与洪深的创作	400
丁西林与李健吾的创作	403
曹禺与现代话剧	405
《雷雨》	406
《日出》和《原野》	409
名篇赏析	412
《北京人》第一幕(节选)	412

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剧	426
《升官图》等戏剧作品	431
名篇赏析	438
雷电颂(节选《屈原》)	郭沫若438
新秧歌运动和新歌剧创作	440
歌剧《白毛女》	443
旧剧改革和《血泪仇》《逼上梁山》 等剧作	446
解放区话剧创作	448

第五编 文学批评

胡适与现代文学批评	453
周作人与“美文”文体批评	455
成仿吾的“批评与同情”	456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苛责与反思	458

鲁迅与方法论	462
李健吾与随笔体批评	467

第一编 小 说

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是“五四”文学革命声中诞生的一种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小说。它取法欧洲近代小说,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既不同于中国历来的文言小说,也迥异于传统的白话小说。现代小说一开始就密切关心现实人生问题。

真正显示了“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的,是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一部分青年作家。他们的短篇小说,描绘了各地颇具乡土色彩的落后、闭塞的村镇生活,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宽广而真实的图画,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1928年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作家们接受国内大革命浪潮和国际左翼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使小说的题材、主题都发生重大的变化。革命斗争生活和革命工农形象开始进入小说创作。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艺术本身的成熟程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中篇小说尤其获得丰收。

抗战的炮火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明显地增长了浪漫主义的成分;形式上则趋于通俗,趋于大众化。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反动逐渐暴露得愈益充分,国民党统治区的小说也愈益向着深入揭露阴暗面方面发展。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到沙汀的《淘金记》、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便是这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由于作家同人民群众的逐步结合,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思想感情到语言形式都大大群众化了,工农兵群众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开始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程度。

鲁 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8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1902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国。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一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1907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1909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切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1912年到1917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蠢蠢欲动。1919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1918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像《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申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1919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到1923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

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除了杂感,鲁迅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又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这些小说,如他自己所说,是从“为人生”出发,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和当时许多所谓“乡土文学”里仅仅对农民表示同情不同,鲁迅写出了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弱点(如阿Q和闰土),他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爱姑),在形象创造中蕴藏着为同类小说所没有的向历史控诉的深度。在他笔底的知识分子也和许多作品里风行一时的所谓苦闷的青年不一样,鲁迅刻划了知识分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赞扬他们的斗争,鞭挞他们的颓唐和动摇(《在酒楼上》、《孤独者》)。在《伤逝》里,描写了“五四”当时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同时又给那种建立在个人幸福上的过于天真的追求以幻灭的结局。认为个性解放需要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反映出鲁迅这一时期对个性主义看法的改变和进展。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虽和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着距离,然而由于鲁迅对时代的敏锐的感觉,在五四运动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坚决地“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因此他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这样他的作品不但高出于一般作家的水平,而且符合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要求,体现了他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作为文化革命主将和旗手的杰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后,资产阶级右翼从统一战线里分裂出去,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闷,鲁迅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他战斗着,同时又思索着和探求着。1925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这两次事件中,鲁迅对主张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展开激烈的论战,揭去“现代评论派”欧化绅士们虚伪的面具,指出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正是帮凶的把戏。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一般的斗争方式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已经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十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经中国共产党提名,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1927年1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十二日,大资产阶级篡夺胜利果实,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于“四一五”发生空前的屠杀,鲁迅向学

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他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并把这个叫做“事实的教训”。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文艺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寻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途径,到此才发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1929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30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1931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1933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1936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1930年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1927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1932年7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集楔帖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

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着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

《呐喊》和《彷徨》

在“五四”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开始创作的目的和他当初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是一致的。他写下将近三十篇小说,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已经暴露无遗,从“五四”起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群众联合,广大人民依旧过着被奴役的生活。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时代。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小说随后结成为《呐喊》和《彷徨》两个短篇集。和旧民主主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提倡的所谓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不同,鲁迅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呐喊》共收1918至1922年间写的十四篇小说,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的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发表于五四运动前一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

贯穿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逐渐地引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主题。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由于它所表现的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这篇小说是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的特征。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穷困潦倒,封建社会一方面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和践踏。小说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又穿着长衫的人。他已经失掉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却仍然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分,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的性格。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孔乙己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善良的地方:不愿意拖欠酒钱,热心地教人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从这些流露着同情的描写里,进一步反衬出科举制度对他精神的戕害。孔乙己的没落是必然的。他活着只是给别人做笑料,死了也无足轻重,“别人也便这么过”。小说以不满三千字的篇幅,简练地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给人以非常真切印象。如果说短篇《孔乙己》已经点出封建制度怎样扭曲一个人的性格,那么,这个主题在《药》里表现得更为沉痛。《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麻痹人民,使他们陷入愚昧和无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已经借狂人的嘴提到过:“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疾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回又从此“生发开去”,写成小说。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痼病,终于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者。小说把被杀的犯人安排为一个革命者,这位没有正式出场的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受苦,而牺牲,反而受了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血。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